

100年前,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刊发了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曾对《狂人日记》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指出“狂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人物根据,而是鲁迅内在意识中“自我”的象征物,是一个艺术的意象、主观的创造品。

〔领读经典〕

##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意象

□王富仁

在“五四”前后,中国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假若从意识深处的变动来说,鲁迅大概是变动得最剧烈、最深刻的一个了。如果我们深入到鲁迅最内在的精神体验中去,我们会感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便是他内在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完全得到表现的自我。

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都有基本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所以不论敌友,都视对方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鲁迅,所怀疑和否定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价值观念的荒谬性,才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民族要自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树立新的价值观念。由于这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鲁迅不能不感到内在的自我已经游离开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文化环境,已经失去了与这个文化环境的最起码的协调和适应的关系,而这也恰恰是一个疯子的表现。一个精神叛逆者和一个疯子在与自己的文化环境的难以协调、难以适应上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所经历的命运也会是完全相同的。非但如此,一个有理智的精神叛逆者甚至还不如一个疯子更能体现彻底的精神叛逆者的特征。所谓“理智”,就是对旧的文化价值观念还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还能依照为自己文化环境中多数人认可的价值标准说话和行动,还能被周围的人视为一个正常的人。而真正的、完全的精神叛逆者,甚至连这些也是难以做到的,因而他的特征更像一个纯粹的疯子。不难看出,正是在鲁迅的内在意识中,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精神叛逆者与精神病患者有了完全相同的性质,但这种相同是“青松”与“英雄”的相同,是“春花”与“美女”的相同,而不是二者客观上的同一性。总之,“狂人”是鲁迅内在意识中“自我”的象征物,一个艺术的意象,一个主观的创造品。在客观现实中,两种“狂人”是不可能完全统一在一起的。

“狂人”是作者的一个主观创造品,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识精神病患者。现代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精神病患者是由于精神压抑造成的。一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本能感觉,因而也有各种源于本能欲望的生活直感,但由于社会文化

的关系,有一些本能欲望找不到一定文化价值标准予以表达,无法升华到意识的层次,受到“超我”和“自我”的束缚和压抑,被沉淀在潜意识的领域。压抑产生精神苦闷,而一旦这种被压抑着的苦闷由于特定原因挣脱了束缚,被解放出来,这个人便陷于精神分裂状态,超我与自我的控制作用失灵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解体了,从而失去了与自己的文化环境的协调关系。当然,鲁迅当时未必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直接影响,但他显然能够感到,他所感到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精神压抑,中国历代的同类人同样也会感到,只是

由于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压抑作用,使他们没有可能升华到理智的层次,而在精神病患者的疯话中,倒有可能曲折地或直接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狂人”这一形象应该是有客观基础的,但要直接从现实中找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仍然是不可能的,并且与现实中的精神叛逆者仍然不是同类性质的人物。

鲁迅把这个精神病患者设定为“迫害狂”,就使他与精神叛逆者有了更加相同的特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归根到底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非人性性质的认识。它的非人性性质,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深深感到中国人民的生存安全感没有起码的保障,人的精神生命更受到它无形的扼杀与摧残。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的恐惧感,恰恰又是与迫害狂患者所感到的恐惧相通的。

“狂人”是鲁迅主观想象的产物,为了区别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将它称为“意象”,而不称为“形象”。(摘自《中国需要鲁迅》,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拉斐尔《雅典学院》局部

彼得·沃森以写作恢宏的思想通史闻名于西方世界,他拒绝缩略和简化的历史作品,而是要写完整的历史作品。沃森认为,历史不仅发生在战场、宫殿与城堡,更发生在人们的思想之中,思想无形而又深刻地塑造着历史。在完成著作《20世纪思想史》之后,沃森又向前追溯,梳理了人类从刀耕火种到微观物理的全部知识发展历程,写就了《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在他的笔下,人类的进步历程因为思想的发展而变得无比清晰。近日,75岁的彼得·沃森来到中国,分享撰史的心得体会,畅谈人类思想的群星闪耀。

### >> 发明不是思想,却能改变思考方式

研究思想史的第一步是广泛地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找出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与他们取得联系,然后拜访他们,有的在英国,有的在法国,有的在美国。他们大多数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一起吃午饭,聊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他们有很多创见其实并不会体现在作品中。我还会询问他们关于各种学者的事情,并以此建立一个相对可靠的学者参考网络,也可以了解到学术界的新发展。我有幸在剑桥大学待过十年时间,研究有关古董走私丑闻的内容,学校会支付我一部分采访费用,而且我在剑桥期间也有很多学者来到剑桥,所以我有机会跟他们交流。与学者交流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过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对于思想史的理解更广阔,会留意一些细节问题,留意思想和世界

的互动关系。很多发明本身并不是思想,但是发明会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比如火本身不是思想,但是人类学会了如何使用火,就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对抗野兽,开垦耕地等等。这一切都会对思想造成影响。还有很多观念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时间的观念,之前我们可能会把时间的具体形式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可是我们为什么区分公元前和公元后?这一区分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的书里有一章专门探讨时间,讨论时钟的发明和分秒的精确性,以及时钟的发明对我们目前的工作日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十二三世纪,人类在精确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音符、标点以及代数的进步都帮助我们更加精确地认识世界。这些变化催生了很多思想产物,进一步影响我们对思想的认识。

### >> 三分思想史:灵魂、欧洲和实验

我在这本书中选出历史上的三大思想,分别是灵魂、欧洲和实验。

关于灵魂的思想,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前,人类更关注外部世界的神,把太阳、月亮、树木或石头当作神灵,但是在灵魂的思想产生之后,人类的信仰发生了向内的转向,我们更关注内心如何能够指引我们的行动,这种转型使得灵魂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各大文明都经历了重要的思想发展,诸子百家、古希腊先哲和以色列先知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第二个思想是欧洲。这里提到的欧洲,指的是作为思想的欧洲而不是作为地理位置的欧洲。在10到13世纪,欧洲诞生了一系列思想,比如世俗世界、人文主义、普遍主义、透视法以及个人主义等等。这个时期也是大学诞生的时期,最早的大学是巴格达的一

所神学院,但是后来关闭了,在它关闭两年之后,欧洲出现了第一所学校——博洛尼亚大学,它开启了欧洲大学的热潮,而大学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

与此同时,东方渐渐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黑死病的爆发。世界文明的中心渐渐向西方转移。伊斯兰世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学者离开巴格达,把很多手稿带到了意大利,这些手稿包含之前很多世界文明的成果。他们把这些阿拉伯文献翻译成了拉丁文,欧洲通过这些手稿重新发现了希腊的传统,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重新发现了希腊的科学。正是欧洲对于希腊科学的重新发现,导致了现在的文明尤其是实验观念的兴起。对我而言,实验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在科学领域,它对民主也是有助力的,实验能够让我们更接近民主的生活方式。

### >> 大学是新思想的家园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教授认为历史是不断摇摆的,有时候会前进,有时候会后退。大学是人类寻求知识的场所,而对知识的寻求并不会左右摇摆,只会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出去。在西方,早期的大学最初培养的是律师、医生等比较专业化、职业化的人物,德国人发明的PH.D(哲学博士)制度大概是教育领域最为天才的发明。哲学博士学位在1810年前后诞生于柏林的洪堡大学。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在选择学术职业之初,会花费两三年的时间,在赚不到多少钱的情况下,仔细研究一些细微特定的问题。有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我们得以用从未有过的细致程度了解我们的世界。所以说大学教育是让人们眼界更开

阔、不固步自封的一个办法。很多互联网公司都起步于大学,虽然他们的创始人很多有辍学经历,但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想法都源自大学,而大学也应当是这些新思想的家园。

有声书或者音频课程这种学习形式并不是不好,但是它一定不如在大学里学习。大学的学习并不是坐在教室里学习一些事实性的知识。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有很多很有人格魅力的老师,他们可以点燃学生对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激情。西方有一种终身教职的制度,教授只要任教达到一定时间,无论你的观念多么不受欢迎,你都不会因此被解雇,这一制度保证了大学思想的自由。

(本文根据彼得·沃森在北京、上海讲座速记整理)

## 彼得·沃森：思想塑造历史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英]彼得·沃森 著  
胡翠娥 译  
译林出版社



赵延年木刻版画《狂人日记》